

红墙★大事

(下)

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
来龙去脉

张树德 著



红墙★大事

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
来龙去脉

(下)

张树德 著

十六 林彪与江青结成同盟的内幕

- 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
- 江青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
- 杨永直打电话问“学阀”指谁，彭真说，是阿 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 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这样评价《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
-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她别有用心地提出了“黑线专政”论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的一个有严重错误的文件。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4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后，由张春桥、陈伯达参加写了一个座谈会《纪要》。3月19日，经毛泽东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纪要》。《纪要》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被一个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从此，林彪、“四人帮”利用《纪要》，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的请示，正式决定撤销《纪要》。然而，关于这个文件的出台前后的一些情况，却鲜为人知……

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

1966年前后，江青等人在文化战线掀起了巨澜。为了实现其目的，江青在林彪的安排帮助下，部队文艺座谈会终于如江青所愿召开……

1966年1月21日，江青专程乘车从上海赶到苏州拜会了林彪。此时，林彪正在这里“养病”。此时的林彪正是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1958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当时在军内，林彪可以说是说一不二。

江青正是看中了林彪这一点。

林彪也果然“识时务”，此时，尽管他一直在直线上升，但他知道，要想爬上更高位，还须仰仗江青，因为“第一夫人”的地位毕竟与众不同，更何况，江青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对于这一点，善于钻营的林彪看得明明白白。这也决定了江青与林彪一拍即合。经过6个小时的长谈，林彪这座“尊神”要为江青“保驾护航”了。

就在江青与林彪密谈的当天晚上，林彪即通过叶群打电话给解放军总政治部

副主任刘志坚，安排所谓的文艺座谈会。刘志坚时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由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身体不太好，所以总政治部的日常事务由刘志坚负责。所以，叶群也就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刘志坚家里。

没待刘志坚有什么反应，叶群已开始传达“指示”：“江青同志想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参加的人不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谈什么内容？”刘志坚问。“不清楚，可能，可能，唔，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叶群搪塞了几句，旋即挂断了电话。

刘志坚接到“林办”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由于身体不太好，经常需要在家休息。听了刘志坚的汇报，萧华心里不觉一沉：江青出于什么目的召开这次座谈会呢？萧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林办”要求萧华去参加座谈会，但他认为刘志坚去更合适，他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于是，萧华和刘志坚商定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员：由刘志坚带队，同去的还有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秘书刘景涛和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萧华还对参加座谈会的几名人员“约法三章”：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二、只带耳朵听；三、江青如果提出问题，与事实出入大，暂不要与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临行前萧华再三嘱咐：“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

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从北京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和《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报告上做的批示和1964年6月27日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做的批示。

毛泽东在柯庆施的报告上做了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

红墙大事

——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下册）

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做了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就是毛泽东的两个文艺批示。

既然是此次“座谈会”的必读文件，刘志坚当然需要再阅读一遍。不久，江青又派张春桥到饭店接刘志坚，一起到江青处“聆听”江青的“教诲”。

见到刘志坚，江青笑着打了招呼：“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有人听了。”江青抱怨道，“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座‘尊神’支持我。”

刘志坚赶紧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这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做了记录。“我临来时，林办要我把一段话念给你听，”刘志坚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逐句向江青转达。“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听了这段话，江青很兴奋，“这是春风呀！”她顺便又恭维了刘志坚几句：“志

坚同志呀，毛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对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我要好好学习呀！……”

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了。这只是“一人谈”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在“座谈会”刚开始，江青就宣布了此次“座谈会”的几条纪律：“这次会议不准记录，不准张扬，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我说的不只是北京市委，而且包括所有在北京的头头都无权知道。像彭真、周扬这种人巴不得专我的政哩！”在江青第一次约见刘志坚的时候，江青就讲过：“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电影中讲一点儿意见。”

“座谈会”果然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夹杂着江青一些“意见”。

据当事人刘志坚回忆，十多天的座谈会主要活动有四项：

一、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前后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说，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二、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就讲到哪，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做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她讲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讲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

如对《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在一次谈话中，还谈到30年代的文艺问题。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话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三、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9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代，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

四、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3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这种所谓的“座谈”，直到2月19日才结束，江青对大家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座谈会”莫名其妙地开始，又莫名其妙地结束。

据几个当事人回忆，江青在这个漫长的“座谈会”上，主要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关于“人”。江青说：“前年根据主席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我提出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嗯！是个骡子也好嘛！周总理又另外开了个民族音乐会，讲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这是错误的，他应该做检讨。”“罗瑞卿说部队文艺路线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军队又不是在真空中。”“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不听主席的。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彭真、周扬在专我的政。夏衍主张‘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列的经，叛人民战争的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

关于“电影戏剧”。江青说：“《武训传》的错误是我发现的。批《海瑞罢官》很难，我克服重重困难，在上海组织了个班子。我是毛主席的‘文艺哨兵’，做了许多调查研究。”“京剧不行了，没有几个人看。唱腔、音乐、舞蹈都要重新来、

重新写。我搞京剧改革，北京给我最差的剧团。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喽！”“《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红日》写的那个连长是个疯子，拿着洋刀，骑着大马乱跑。《阿诗玛》只会谈情说爱，很糟糕。《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都哭了。陈戈这个人没有阶级感情呀！电影界在胡闹，好不容易树立起一个英雄就让他死了。《东方红》不能算好的典型，最后那场的水旗舞是我坚持搞的，可是这对整体起不了作用。《海鹰》前半部是我们自己的，后面就变味了。《南征北战》《万水千山》都要重拍。唔，好像就是《平原游击队》还勉强可以。《南海长城》看了样片，那个色彩，有的深，有的浅。演员也不入戏，呵呵——既然叫长城，就要有正规军，海、陆、空都要有嘛！”

关于“外国的艺术”。江青说：“外国的电影大部分是腐朽、反动的。苏联电影有不少坏东西。《静静的顿河》那个格里高利就是个土匪、叛徒。肖洛霍夫这家伙要好好批。”

关于“文艺的方向”。江青说：“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美化敌人，歌颂叛徒，丑化人民和军队。有的宣传战争苦难，搞和平主义，有的是低级趣味。写中间人物、写死人，死了的英雄也是死人。有的还为活人树碑立传。唉呀呀，丑死了。”

江青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 “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

“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出于要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的考虑，当即与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每次谈话后的追忆，逐段逐句进行讨论，由黎明记录，陈亚丁整理修改，于2月20日晚整理成约3000字的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并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

《汇报提纲》写了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部分写座谈的经过。

第二部分写在“座谈”中讲的“意见”，包括以下几方面：1. “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2. “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3. “‘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4. “‘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5. “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6. “开展文艺评论。”“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7. “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8. “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八条措施：一、“预定在4月召开创作会议。”二、“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三、“在1967年10月1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五、“整顿总政电影制片局。”六、“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七、“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八、“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呢？刘志坚陷入踌躇之中。经过4人反复讨论，认为还是送上一份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要知道这件事。于是，21日送了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

22日，刘志坚等人离开上海，乘飞机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做了汇报，并送了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23日，刘志坚等人乘机飞往北京，没想到刚到北京就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原来江青对提纲不满意！

电话是江青的秘书打来的，对方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见，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

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经与萧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飞回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都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萧华特意关照陈亚丁：“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于是，陈亚丁再次飞往上海。

2月25日下午，当陈亚丁带着原稿风风火火地奔回上海延安饭店时，张春桥已在—层饭店等着他了。见到了江青，陈亚丁才知道其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修改工作。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第一次修改，陈伯达就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第二，“要用重彩浓墨写一段这几年的文艺方面的成绩，那就是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了许多嘛，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呵，这些个，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瑰宝。”“这才叫推陈出新，才叫创举。江青同志亲自抓试验田，搞出好的样板，是标社会主义的新，立无产阶级的异，我看只有这样改，‘破’什么‘立’什么才会鲜明、清楚。”

陈伯达的一番吹捧，感动得江青连声叫好：“听听！这就是‘党内第一支笔’的厉害。春桥、亚丁你们听清了没有？伯达同志一下子就击中要害。真是难得，真是金石之言！修改时，一定要加上。”江青还不忘送给陈伯达一个顺水人情：“哼，还有人说伯达同志只会写文章，这是偏见，是嫉妒！没有大政治家的水平，哪能写出这样掷地有声的文章？！我要告诉主席，一定不能委屈伯达同志。”江青一再表示：“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当日，陈亚丁按照江青的要求，把陈伯达的意见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

红墙大事

——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下册）

连同自己根据追记补充的内容，全部改写在一份稿子上。27日上午，张春桥与陈亚丁商量又对稿子做了些改动。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陈亚丁一起对修改稿进行讨论，而后由陈亚丁再修改一遍。

28日上午经张春桥、陈亚丁文字加工，晚上读给江青听，得到江青认可。这次大修改，对汇报提纲结构没做改动，但在内容上做了很多的增删和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的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题目虽还叫《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但已不是原来那个汇报提纲了。

江青把这份新的纪要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做了修改”。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内容上共做了10多处的修改。其中既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如“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对“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等。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做充实和修改”，于是，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做充实和修改，而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5个人一起从12日至14日对稿子再做一番修改。

陈伯达不愧为“大秀才”，他在稿子中加入了这样一段话：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作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

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杨永直打电话问“学阀”指谁，彭真说， 是阿 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这时期，曾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出的《二月提纲》。可以说，《二月提纲》与后来出台的《纪要》是相对抗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纪要》出台的重要背景。

关于起草《二月提纲》问题，还需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说起。1965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很快导致了中央领导层的严重意见分歧。《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根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习明朝清官海瑞敢于讲话精神写出来的。这件事震动了全国。

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写成的。江青后来自己也说，他们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保密了七八个月”。文章发表前有意隐瞒了中央“一线”领导人。她先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但是没有被毛泽东接受。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越来越严重，康生也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罢官有关，这一提法改变了毛泽东的倾向，使他由反对批判《海瑞罢官》到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江青等人搞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就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据说，姚文元的那篇文章，“毛泽东看了3遍，认为基本上可以了”，才让江青拿回上海发表。当然，关于这篇文章，毛泽东并没有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通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中一些历史故事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调整措施联系起来，诬陷吴晗为国内的反动派“翻案”，鼓吹“退

田单干”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但引起了不少史学家和一般读者的不满，而且也违反了中央关于点名批判文章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规定。

江青满以为该文发表后会掀起巨澜，可是北京各报迟迟没有转载，用江青的话讲“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实际情况是，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全不知道，就连主持中央和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也不知道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于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没有指示全国报刊马上转载。《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向《文汇报》了解背景，也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半个多月里，只有华东局所领导的《解放日报》《浙江日报》等7家报纸因为得到指示予以转载，其他报纸没有转载。这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他指示上海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

11月下旬，周恩来在上海、彭真从罗瑞卿那里（罗是从上海回来的）了解到这篇文章的背景，于是指示各家报纸予以转载，就连《人民日报》也在拖延了20天后，才奉命转载，并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但为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们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毛泽东认为，彭真在抵制这场批判，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样，《海瑞罢官》被升级为所谓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的政治问题。整理讲话时，田家英、胡绳认为这段话所说并非事实，没有整理进去（当然这也成了他们后来被打倒时的主要罪证之一），彭真也没有传达这些内容。与此同时，中宣部还压了戚本禹等人批判罢官要害的文章，不同意发表。这就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迅速扩展到史学、文艺、教育等领域，涉及的人愈来愈多，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社会上引起了思想混乱。对此，北京市委、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抵制态度。

同时由于姚文元的文章已经打破了中央关于点名批判的规定，为了对学术讨

论中“左”的偏听偏信加以适当的限制，1966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听取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会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这5个人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在这次会议上，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上还讨论了关锋写的把吴晗与彭德怀联系起来的批判文章，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说法。会议一致通过了将这次讨论情况写成一个向中央汇报的提纲的决定，彭真指定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执笔起草。几天后，他们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五人小组包括康生都圈阅同意。

2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家中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常委们经过讨论，同意提纲的意见。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没有表示反对，只是问，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毛泽东又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

2月12日，彭真等人又到上海，让张春桥、江青等人看了《二月提纲》，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但张春桥说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的说法还需要再研究。同一天，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最后，经过邓小平批准，中共中央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指导学术运动。

《二月提纲》大致有六方面内容：一、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二、方针。三、队伍。四、“左派”也要互相帮助。五、准备工作。六、设立以许立群、胡绳为首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关于当前批判运动的性质，提纲划定为“学术批判”的性质。关于方针，提纲指出，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提纲指出要慎重，要经中央批准。关于队伍，提纲强调“要依靠坚定的‘左

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针对那些变学术讨论为政治攻击的做法，提纲警告说：“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然而这一正确提法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彭真等人的抵制以及《二月提纲》的通过，江青、张春桥等人极大地不满，不甘心被彭真等人占了上风。这也成了江青在上海搞《纪要》的重要背景。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都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国都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包括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各个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中宣部在当前学术批判中没有支持“左派”，是在压制“左派”……

4月9日至12日，在讨论学术批判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这样评价《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江青等人加速了《纪要》的定稿速度，他们要以《纪要》与《二月提纲》相抗衡。

毛泽东在看了送去的《纪要》后，曾先后两次写信给江青。一封是3月17日致江青的信。信中说：

江青：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

3月17日

另一封是3月24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中说：

江青：

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了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毛泽东在看了《纪要》后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有的地方加了话，有的地方做了修正。

对于前面江青召开刘志坚等人“座谈会”要看的两个文件之一，并在《纪要》中提到的《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此件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在《纪要》中，毛泽东加写的话有：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开展起来了。”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参考。”

毛泽东在审阅《纪要》时做了许多修改。如：《纪要》中提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四篇著作”。毛泽东把原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改为“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当《纪要》中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在审阅时，将引号内的文字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写了“这样较妥”的批语。